

从三重向度深刻理解抗战精神

魏文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抗战精神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从传承民族精神、凝聚复兴伟力、践行全球担当三重向度,层层递进来理解抗战精神的时代价值,这既是对历史的敬畏与回望,也是在新时代传承民族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彰显大国格局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

首先,从传承民族精神的向度来看。中华儿女自古以来就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屈原对民生的悲悯、李白主动报国的壮志、陆游无羌境遇的坚守、李贺为国献身的决绝,让家国情怀超越了地域与时代的限制,成为融入中国人血脉的精神基因。这种情怀,在抗战时期,被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以生命和热血深刻践行。左权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指挥官,牺牲时年仅37岁,朱德凭吊他的诗句不绝回响:“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赵一曼以柔弱身躯扛起抗战重任,她用酷刑下的坚守,诠释了“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成为女性抗日英雄的精神标杆。除了这些人物,还有许多值得铭记的英雄,他们的事迹同样彰显着不屈的民族气节。抗战

精神虽然是抗日战争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但更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精神薪火相传的体现。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本质上是延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践行。因此,在新时代只有传承和弘扬民族精神,提高中华儿女的民族认同感,才能形成推动民族进步的强大合力。例如,深度挖掘红色教育基地所承载的革命历史、英雄事迹与精神内核,将其作为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突破传统说教形式,设计情景再现、实景研学等活动,让大众在身临其境的参与中,直观感受革命先辈们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峥嵘岁月,深刻体悟其中蕴含的抗战精神,切实增强民族认同感与凝聚力。

其次,从凝聚复兴伟力的向度来看。抗战精神承载着民族的记忆,具有厚重的历史底色,而民族精神的传承最终要落到实践层面。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这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提供了条件和机遇,也带来了潜在风险和考验。恩格斯指出:“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可见,思想领域绝非物质条件的被动附属,而是能够主动作用于物质现实,甚至为物质条件的突破提供

动力支撑的能动力量。因此,要立足时代需求,将强大的精神力量,转化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际动能,进而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将抗战精神中那份坚韧与执着,融入到日常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例如面对全球的科技竞争,科研工作者要以先辈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斗争、不畏艰难的意志,扎根基础研究的“无人区”,勇闯技术创新的“深水区”,全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筑牢根基。着力弘扬这一精神,能够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斗志,凝聚共同奋斗的思想共识,攻克前进道路上的发展难题,为新时代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伟业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最后,从践行全球担当的向度来看。抗战精神是链接中国与世界的精神桥梁,也为全球治理、人类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人类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抗战的全球意义,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国界,抗战精神中“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坚韧,恰恰是践行全球担当的体现。

新时代,抗战精神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已经转化为当代中国“为世界谋大同”的大国自觉。这种转化,让抗战精神不再是历史记忆,而是成为中国参与全球事务的“精神坐标系”,它提醒中国,大国担当不是“霸权式主导”,而是坚守和平与正义,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始终要将人类共同福祉纳入行动视野。新时代大力弘扬抗战精神,不仅要在精神层面传承,更要为全球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力量。由此,我们要大力倡导和平发展,深化和平理念传播与教育。同时通过国际文化交流、主题展览、纪录片等形式,向世界阐释中国不搞霸权、提倡互利共赢的发展观,让和平发展理念成为更多国家的共识;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通过多边对话协商化解地区冲突,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抗战历史带来的深刻教训告诉我们唯有和平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如今,世界多极化趋势深入发展,各个国家紧密相连,经济交融、命运与共的特征愈发凸显,只有始终秉持和平共处原则,深化国际协作,才能在应对全球危机上携手发力,才能在人类在稳定有序的环境中共享发展成果,朝着共同繁荣的目标稳步前行。

以史为鉴育新人:教育的启蒙使命与时代传承

李梦雅

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不仅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教育使命的深刻诠释。它以生动形象的仪式语言,将抗战精神与时代要求融入培育新人的精神谱系,为新时代教育提供了鲜活的教材。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教育是培育新人、传承历史的重要载体。从古至今,教育始终肩负着启蒙思想、传承文明、塑造灵魂的使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教育都以独特的方式回应着时代的需求,而以史为鉴,能让我们更清晰地把握教育的本质,明确其在当下的启蒙使命与时代传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教育始终体现着思想启蒙和时代的特征。鸦片战争让有识之士觉醒,这一时期的教育以“救亡图存”为时代主题,也开启了我国教育近代化的探索进程。洋务派提倡西学技艺,维新派倡导废八股、兴办京师大学堂,每一步探索都在救亡图存的呐喊中闪烁着思想启蒙的光芒。进入近代社会转型期,教育随之发生变化。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教育转向塑造国民意识。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批判旧道德,推动教育内容与社会革新深度融合。新中国成立后,教育转向服务国家建设的实践层面。一方面开展扫盲运动普及基础教育,另一方面构建门类齐全的高等教育体系,为国家工业化建设输送技术人才、为社会主义事业培育建设者。这一阶段,“教育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越发鲜明。改革开放至今,教育进一步主动对接时代。从恢复高考到“科教兴国”战略,再到新时代“双减”政策回归育人本质,教育始终以思想启蒙与能力培养,支撑国家发展、回应时代需求。教育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通过人文教育启蒙人民大众。

历史的经验教训深刻揭示教育中人文精神的缺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雅斯贝尔斯认为:“精神是创造性直觉的动力源泉;没了想象,科学就会死气沉沉。”在他看来,科学的进步不只是冷冰冰的公式与数据的堆砌,还有创造性直觉的迸发、科学探索的热情。这些直觉和热情源于人内心深处精神力量,而人文科学的长处恰恰就是研究人的精神世界。但教育中仍存在“重科技轻人文”的倾向,这正是“钱学

森之问”的深层指向。真正的杰出人才,绝不是只会攻克技术难题的“机器”,而是兼具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能为人类发展贡献智慧的有灵魂的创新者。若教育忽视人文精神,便难以培养出具备大格局、大情怀的创新人才,最终会让教育沦为服务于短期功利目标的工具附庸,失去其“育人”的本质初心。日本731部队的罪行便是最惨痛的证明,用于治愈疾病、守护生命的医学、微生物学等科技,却在军国主义的裹挟与人文精神的崩塌下,成为活体实验的凶器。没有了人文精神的指引与约束,科技沦为暴行的帮凶。这段沾满血泪的历史永远警示着我们,脱离人文精神的科技,终将走向文明的对立面。因此,唯有科技与人文共生,才能实现真正的“自强”。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我国的教育需从抗战中汲取经验教训,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第一,深化思想教育 with 党性教育。青年学生的强大力量在五四运动中充分彰显,正如毛泽东所认为的,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某种先锋的作用”。而要发挥青年最炙热的力量,首先就要唤起他们的爱国热情。陶行知认为:“一国的存亡,看国民有爱国的心没有。有了爱国心,虽亡必存,没有爱国心,虽存必亡。”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绝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将历史通过仪式化的形式,让学生在情感共鸣中增强民族认同感。例如,可将阅兵中的战旗故事纳入教材,通过介绍战旗背后的英雄故事,引导青年学生了解爱国主义的深刻内涵;组织学生观看抗战、阅兵等纪录片,开展主题讨论,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转化为青年学生的具体行动。除了青年,领导干部也是思想教育的重要对象,特别是对领导干部进行党性教育。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少数”,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直接关系到政策执行的方向与成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肩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任务十分繁重,面临的执政环境异常复杂,自我革命这根弦必须绷得更紧。”抗战历史与阅兵盛典正是淬炼党性的生动教材,要多组织领导干部走进抗战纪念馆、阅兵装备展示场馆开展现场教学,重温入党誓词,感悟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并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同时,可通过模拟基层治理难题、重大突发事件应对等实践训练,推动领导干部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中

锤炼党性修养。要直面群众的急难愁盼,践行对党和人民的承诺。此外,还可邀请抗战老兵、受阅官兵进行宣教,通过亲历者的讲述,让领导干部在鲜活的故事中感悟党的初心和使命,确保党性教育不流于形式,真正内化于心干事创业的精神动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筑牢思想根基。

第二,平衡人文教育与科技教育。当今世界的主题虽然仍是和平与发展,但局部地区仍存在战争,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加强科技教育,发展科技保障自身安全的行为无可厚非,但是过度追求科技教育而忽视人文教育就会导致种族的冲突、贫富差距等问题的产生。怀特海认为,科学技术教育如果没有文科的参与,就会逐渐变得狭隘和平庸,因为人文教育是一种训练思维能力和提升美学鉴赏力的教育。因此,平衡二者,既是对历史教训的回应,更是培育新人的应有之义。在教育实践中,这种平衡绝非简单的保持平均比例,而是要实现科技与人文的深度融合、相互滋养。首先,在理工科课堂上,不能只教授专业知识,而应该围绕主修的专业向四周发散,开设相关的人文社科类课程。正如阿什比所说:“在理工科大学的课程中,如果没有人文社科和社会学科这种重要成分,就根本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因此,要开设“科技伦理与战争反思”专题,引导学生思考科技如何服务于和平,避免技术异化为伤害人类的工具。其次,在文科专业的教学中,也需融入科技视角。弗莱克斯纳认为,人文学科既指传统的人们所公认的人文学科,也指深奥的科学知识本身所蕴藏或固有的人文价值。从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师生在防空洞里演算数学公式、研发无线电设备支援前线故事,到当今“一带一路”倡议中科技合作如何缩小国家间发展差距,通过这些让学生理解科技不仅是冷冰冰的工具,更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桥梁。最后,这种融合更应该延伸到实践层面。组织学生开展“科技与人文”主题项目,推动理工科学生与文科学生组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整理抗战老兵口述史,既锻炼学生的数据处理与算法优化能力,又能让学生在倾听历史细节中深化对家国情怀的理解;引导学生针对社会问题,攻克技术难题的同时,体会科学技术的人文价值。

第三,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教育的启蒙使命与时代传承,离不开一套有温度、有力量、有共鸣的话语体系。它既要能承载历史记忆的厚

重,又要能贴合当代人的认知习惯;既要能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又要在国际语境中传递中国教育的价值追求。构建这样的话语体系,首先要以史为鉴。抗战记忆不应该只是教科书上的年份与事件,而应该是教育话语体系中鲜活的“视觉符号”。要将这些事件转化为教育素材,比如在课堂上讲述战旗背后的具体故事,而非笼统提及;用科技还原西南联大师生的办学场景,而非简单描述办学的不易。其次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面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倾向,教育话语体系不能仅靠反驳,更要靠建构,用史料、理论和逻辑,构建起不可动摇的历史认知。例如,针对否认我国抗战贡献的谬论,可在教育中融入历史细节,通过展示抗战时期的装备、会议文件、照片等,证明英雄事迹的真实性,凸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体性。通过这些话语体系的构建筑牢思想防线,让人们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辨明是非。最后要具备国际视野。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不仅要培养具有民族认同感的中国人,更要培养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世界公民。可将抗战中的国际合作故事纳入话语体系,比如讲述白求恩医疗队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细节,结合阅兵中国际友人观礼团场景,阐释“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科技教育中,既要讲中国科技自强的成就,也要讲“通过科技创新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引导人们理解科学技术发展不是为了霸权,而是为了合作共赢、守护和平。这种包容性话语,既坚守中国立场,又展现大国胸怀,让时代新人在理解民族使命的同时,也明晰人类共同责任。

教育是连接历史与未来、沟通个体与民族、对话中国与世界的桥梁。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我们需“以史为鉴”,进一步强化青年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深化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同时,要促进人文教育与科技教育的深度融合、协同共进,着力打造兼具中国特色与时代价值的话语体系。只有这样,才能让“育新人”的时代使命真正落到实处,才能让教育在代代传承与不断创新中,始终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输送源源不断的精神养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绵绵不绝前进动力。中华民族伟大荣光不可挡!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必将胜利!

“伟大的抗战精神,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在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抗战精神犹如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镌刻着民族危亡之际的觉醒与抗争、团结与牺牲。这种精神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时空,成为融入民族血脉的文化基因和力量源泉。新时代背景下,继承和弘扬抗战精神不仅是对历史的深切回望,更是对未来的坚定指引。

历史承载过去,也启迪未来。从杨靖宇将军“舍身取义”的英雄气概到边疆战士陈祥榕“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坚定誓言,从狼牙山五壮士“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到公安民警“永保忠诚”的使命担当,抗战精神形成的精神纽带贯穿至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这既是对无数抗日先烈的精神的高度凝练,也是我们必须坚守的价值遵循。”《铜仁府志》中“俯身列营伍,死当以马革裹尸,乃为丈夫”的记载,凝练出深植于铜仁大地的忠义精神,它与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抗战精神一脉相承。步入新时代,铜仁当以这份精神传承为根基,在赓续其风骨的同时续写抗战精神的时代新篇。

首先,要开设地方教育特色课程。教育对人的塑造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康德曾经说过“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一个人”。因此,铜仁要在充分发挥课堂在教育中的主渠道的作用的同时,还要创新教育的形式和载体,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教育。例如,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搭建数字化爱国主义教育平台,将当地抗战的历史故事与民族精神贯穿于各学段教学中,通过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让历史场景生动再现,增强教育的沉浸感和感染力。要深入挖掘和整理本地区抗战历史资源,建立抗战历史档案数据库,组织专家学者开展理论研究和阐释工作,比如今年8月24日在松桃苗族自治县欧百川故居陈列馆举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暨武陵山各族子弟抗战历史学术研讨会”等,推出一批有深度、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学术支撑。

其次,要积极举办多项活动。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精神力量只有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才能转化为现实力量。铜仁要充分利用重要历史纪念日和传统节日,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仪式、专题展览、文艺演出等活动,宣传抗战精神,营造崇尚英雄、学习楷模的社会氛围。在举办活动的过程中积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切实参与到实践中来,使其深刻体会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密切相关,增强民族认同感,凝聚社会共识,激发人民群众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

再次,要鼓励进行文艺创作。文艺作品可以充分利用先辈们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通过文学艺术这一形式,将历史与现在连接起来,激发人民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认同感。影视作品可以通过形象描述将抗战精神展现给观众,从而使观众对和平倍感珍惜。同时可以制作与抗战精神相关的动漫。动漫在如今很受当代青年人追捧,可以将抗战精神通过更多的细节描写,进行全方位的回顾。此外,还可以鼓励抗战精神融入诗歌、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通过这些实实在在的创作,既传承抗战精神,又赋予抗战精神以新的时代表达,展现抗战精神在新时代的生命力和价值。

最后,要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互联网作为这个时代最具发展活力的领域,不仅要充分发挥其积极、进步的一面,也要同一切消极、落后的舆论做斗争。铜仁市通过一系列线上宣传抗战精神的活动,充分发挥新闻媒介的作用,这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民的价值取向,巩固人民精神的“战略高地”。面对可能造成舆论影响的负面能量,要加以管控,完善安全体制机制,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新闻媒体的发展还会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供力量,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推进平安铜仁建设,进而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将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总之,继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系统工程。铜仁应以九三阅兵为锚点,铭记历史,面向未来,通过开设地方教育特色课程、积极举办多项活动,鼓励进行文艺创作,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让抗战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芒。这不仅是对革命先辈的最好告慰,更是对未来的庄严承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铜仁将会在继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中书写出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应有的力量。

弘扬抗战精神

续写奋进新篇

王明阳